

以滇文化塑牛青铜器看滇国社会的发展与演进

吴 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 要: 滇文化的青铜器上有许多的动物造型, 其中以塑牛的造型居多。本文通过对滇文化塑牛青铜器类型的介绍和要素统计, 归纳了这种塑牛造型的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其与滇国社会的发展相联系, 发现这种青铜器上的塑牛造型及其器型的发展轨迹与滇国社会的演进基本是一致的。

关键词: 塑牛青铜器; 滇国社会; 发展与演进

滇国, 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活跃于云南滇池及其周边地区的滇人建立的王国。根据已有研究, 滇国最迟在战国中期已经建立, 一直延续至汉武帝征服滇国, 并在该地区设立益州郡(公元前 109 年)为止^[1]。从考古学文化上讲, 滇文化应是由滇人创造的考古学文化, 主要包涵了滇国时期滇人创造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滇人建立滇国以前的考古学遗存应视为先滇文化, 其与滇文化在文化因素上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两者在年代上有较大的缺环, 器物组合也有较大的差异^[2]。滇国被征服以后, 滇人继续生活在这一地区所遗留的考古学遗存可视为滇遗民的遗存, 汉武帝设郡后至东汉初期, 这一地区由滇王继续统治, 滇国由原来的独立王国降为了汉朝属地, 但是其文化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东汉前期, 滇文化的文化因素完全融入到汉文化中, 滇文化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滇文化以其精美的青铜器闻名于世, 尤其是各种带有动物造型的青铜器, 更是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滇国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百态。这些青铜器上塑造的动物造型有牛、虎、鹿、豹、鸟、蛇、猴、马、羊等, 而在所有的动物造型中, 以牛最为常见, 而牛所附载的青铜器种类也最为丰富^[3]。由此可见, 牛在滇文化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以往学者对滇人重视牛的现象已有了一定的关注, 并提出牛与祭祀活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4]。本文将以滇文化青铜器动物造型中最具代表性的塑牛造型为出发点, 对其反映出的一些现象进行归纳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指的塑牛造型, 主要是指铸造或浮雕的牛的造型。

一、塑牛青铜器概况

滇文化青铜器的塑牛造型丰富, 其姿态主要有立牛、卧牛和牛头, 这些造型或焊铸在青铜器上, 或独立成形。本文统计了 45 座出土塑牛造型青铜器的墓葬(表一), 它们主要分布于晋宁石寨山^[5]、江川李家山^[6]、呈贡天子庙^[7]、曲靖八塔台^[8]、昆明羊甫头^[9]等滇文化墓地。根据器型种类的不同, 我们将装饰有塑牛造型的青铜器分为以下几类:

1. 生活用器

这类器物中, 器型主要有容器、针线盒、枕、案等。牛的造型主要焊铸在器皿的盖顶, 少数位于肩部或直接以牛为主体, 有立牛造型, 也有卧牛造型, 标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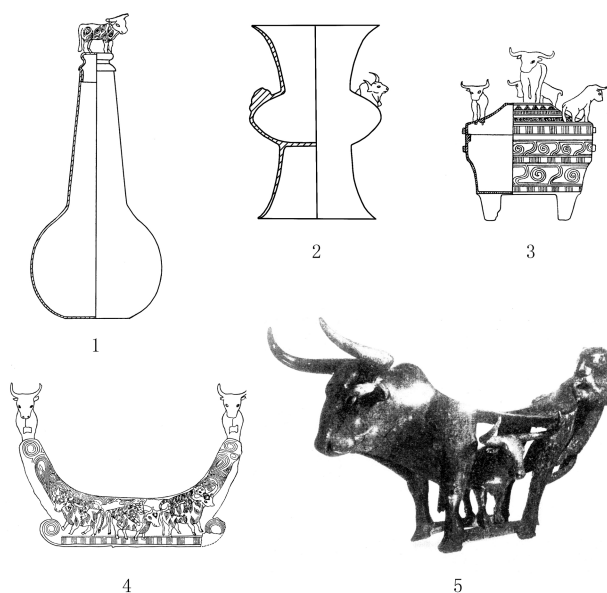
李家山 M24: 24, 立牛壶, 盖顶焊铸 1 头立牛。高 35.5 厘米(图一, 1)。

石寨山 M17: 29, 双卧牛尊, 肩部焊铸对称 2 头卧牛。口径 16.7、腹径 17.1、圈足径 15.8、高 26.1 厘米(图一, 2)。

李家山 M23: 6, 四立牛针线盒, 盖顶焊铸 4 头立牛。口径 14.4、高 21.4 厘米(图一, 3)。

李家山 M17: 12, 双立牛枕, 顶端各焊铸 1 头立牛, 背面浮雕三组猛虎噬牛图案。长 50.3、宽 10.6、高 15.5 厘米(图一, 4)。

李家山 M24: 5, 虎噬牛案, 主体为 1 头立牛, 四足作案足, 前后蹄间有横梁相连, 牛背为椭圆形盘状作案面, 另铸 1 只虎扑于牛尾, 牛腹下横立 1 头牛犊。长 76、高 43 厘米(图一, 5)。



图一 滇文化塑牛铜生活用器

1. 立牛壶（李家山 M24: 24） 2. 双卧牛尊（石寨山 M17: 29） 3. 四立牛针线盒（李家山 M23: 6） 4. 双立牛枕（李家山 M17: 12） 5. 虎噬牛案（李家山 M24: 5）

2. 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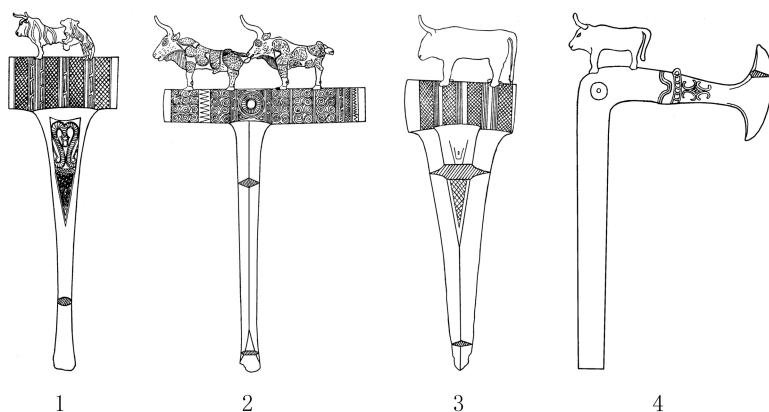
这类器物中，器型中以啄最多，也有少量的戈和钺。牛的造型多塑造在鋬的顶部，多为立牛，也有牛与其人或动物的组合，标本如下：

李家山 M24: 13a，虎噬牛啄，鋬背焊铸虎噬牛。通长 25.2 厘米（图二，1）。

李家山 M13: 25，双立牛啄，鋬背焊铸 2 头立牛。通长 26.6、鋬长 14.9 厘米（图二，2）。

李家山 M24: 22，立牛戈，鋬背焊铸 1 头立牛。通长 25.6、鋬长 8.3 厘米（图二，3）。

李家山 M24: 20，立牛钺，鋬部弯折处焊铸 1 头立牛。长 34.2、宽 20、刃宽 9.4 厘米（图二，4）。



图二 滇文化塑牛铜兵器

1. 虎噬牛啄（李家山 M24: 13a） 2. 双立牛啄（李家山 M13: 25）
3. 立牛戈（李家山 M24: 22） 4. 立牛钺（李家山 M24: 20）

3. 礼（乐）器

这类器物中，器型主要有贮贝器、伞盖、鼓、杖头笙等，以贮贝器最多，多为数量不等的立牛焊铸于器物顶部或是以牛为主体纹饰，少数为卧牛或是将牛作为主体纹饰的一部分，标本如下：

李家山 M57：85，立牛贮贝器，盖顶铸 1 头立牛。通高 32、器身高 23.3、盖径 22.9、底径 21.6 厘米（图三，1）。

天子庙 M33：1，五牛贮贝器，盖顶周边焊铸 4 头牛，中央立柱上焊铸 1 头牛。通高 48.5、盖径 22、底径 16.5 厘米（图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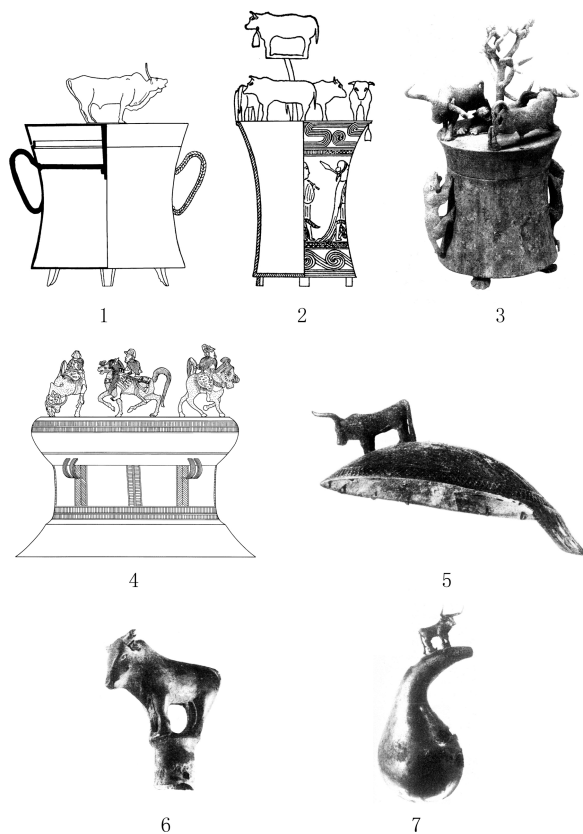
石寨山 M71：133，二牛搏虎贮贝器，盖顶焊铸一虎作嘶吼状，两侧各有一牛作搏斗状，虎的一条后腿被一牛挑穿，器盖中心有一树，树上有两猴、两鸟，器身有对称的虎形耳。通高 42.8、身高 22.3 厘米（图三，3）。

李家山 M51：262，三骑士立牛鼓，鼓面焊铸 3 个骑马武士和 1 头立牛。通高 46.2、鼓高 31.2、面径 39.7、胴围 138.2、腰围 108.4、足围 157.5 厘米（图三，4）。

李家山 M18：10，立牛伞盖，顶部正中焊铸 1 头立牛。高 14、直径 33.5 厘米（图三，5）。

李家山 M17：32，立牛杖头，釜背上焊铸 1 头立牛，木杖已朽。杖头长 7、釜径 2 厘米（图三，6）。

李家山 M24：40a，立牛笙，顶端焊铸 1 头立牛。高 28.2 厘米（图三，7）。



图三 滇文化塑牛铜礼（乐）器

1. 立牛贮贝器（李家山 M57：85） 2. 五牛贮贝器（天子庙 M33：1） 3. 二牛搏虎贮贝器（石寨山 M71：133）
4. 三骑士立牛鼓（李家山 M51：262） 5. 立牛伞盖（李家山 M18：10） 6. 立牛杖头（李家山 M17：32）
7. 立牛笙（李家山 M24：40a）

4. 装饰品

这类器型全部为扣饰，牛在扣饰上的出现和组合形式多样，有的与人组合，有的与其他动物组合，有的仅有牛或牛头，标本如下：

李家山 M68X1: 30, 五人缚牛扣饰。长 10.2、高 6.8 厘米 (图四,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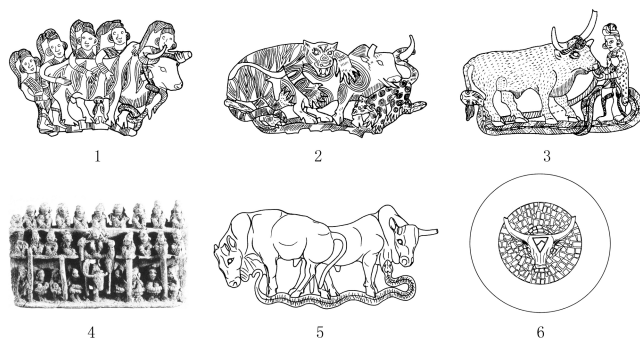
李家山 M68X1: 51-1, 虎豹噬牛扣饰。长 11.4、高 5.9 厘米 (图四, 2)。

李家山 M71: 38, 喂牛扣饰。长 11.6、高 8.3 厘米 (图四, 3)。

石寨山 M3: 140, 斗牛扣饰。分上中下三层, 上层跪坐十人, 中层左右两端个跪四人, 中间一人作关门姿势, 下层中间有一道门, 门内一牛奔入, 中层关门的人以双杠向内阖, 下层左右各四五人, 互相照应, 似要捕到此牛。长 9、高 5.7 厘米 (图四, 4)。

八塔台 M69: 21, 双牛扣饰。长 15.2、高 6.7 厘米 (图四, 5)。

八塔台 M41: 4, 牛头扣饰。圆形, 镶嵌方形绿松石。直径 13.4 厘米 (图四, 6)。



图四 滇文化塑牛铜装饰品

1. 五人缚牛扣饰 (李家山 M68X1: 30)
2. 虎豹噬牛扣饰 (李家山 M68X1: 51-1)
3. 喂牛扣饰 (李家山 M71: 38)
4. 斗牛扣饰 (石寨山 M3: 140)
5. 双牛扣饰 (八塔台 M69: 21)
6. 牛头扣饰 (八塔台 M41: 4)

5. 牛

这类器型均为独立的牛的造型, 有立牛, 也有卧牛, 标本如下:

羊甫头 M19: 139, 立牛。长 6.2、高 3.2 厘米 (图五,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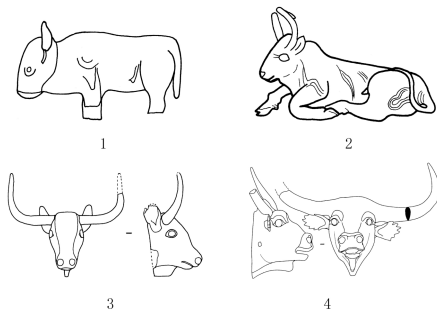
羊甫头 M113: 237, 卧牛。长 6.5、高 4 厘米 (图五, 2)。

6. 牛头

这类器物均为独立的牛头造型, 标本如下:

李家山 M68: 47, 角间宽 7.9, 高 4.5 厘米 (图五, 3)。

李家山 M47: 203-3, 角间残宽 15.3、高 7.7 厘米 (图五, 4)。



图五 滇文化铜牛、铜牛头

1. 立牛 (羊甫头 M19: 139)
2. 卧牛 (羊甫头 M113: 237)
- 3、4 牛头 (李家山 M68: 47、李家山 M47: 203-3)

二、塑牛青铜器墓葬的数据分析

根据发掘报告、简报对墓葬年代的判定, 并参考目前所见较为详细的对滇文化墓葬的分期研究

^[11]，我们将出土塑牛造型青铜器的滇文化墓葬年代划分为三个阶段（表一）：

第 I 阶段，战国晚期—西汉前期，共 22 座墓葬，分别是李家山 M11、M13、M14、M17、M18、M21～M24，天子庙 M33、M41，羊甫头 M104、M113、M115、M130、M413、M648，石寨山 M14～M17。

第 II 阶段，西汉中后期，共 21 座墓葬，分别是石寨山 M1、M3、M4、M6、M7、M10～M13、M18～M22、M71，八塔台 M41，李家山 M47、M51、M57、M68、M71。

第 III 阶段，西汉晚期～东汉初期，仅见 2 座墓葬，分别是李家山 M69，八塔台 M69。

表 一 滇文化塑牛青铜器出土墓葬及数量登记表（单位：件）

序号	墓 葬	性别	规模	生活用器	兵器	礼器	装饰品	牛	牛头	年代
1	李家山 M24	男	大型	5	3	4	1	1		I
2	李家山 M18	女	中型	3		2		1	2	I
3	李家山 M17	女	中型	3		3		1		I
4	李家山 M23	女	大型	2		2				I
5	李家山 M22	女	大型	1		1		1		I
6	李家山 M11	女	中型	1						I
7	李家山 M14	男	中型				1			I
8	李家山 M21	男	中型	1		2	1	1		I
9	李家山 M13	男	小型		1					I
10	天子庙 M33	男	中型			1				I
11	天子庙 M41	男	大型			1	3			I
12	羊甫头 M19	男	大型					1		I
13	羊甫头 M30	女	大型			1				I
14	羊甫头 M113	男女	大型					1		I
15	羊甫头 M115	男	大型			2				I
16	羊甫头 M104	男	中型				1			I
17	羊甫头 M648	男	小型				1			I
18	羊甫头 M413	男	中型				1			I
19	石寨山 M14	男	中型	1		1		1		I
20	石寨山 M15	男	中型	1						I
21	石寨山 M16	男	中型	1				2		I
22	石寨山 M17	男	中型	2		2			1	I
23	石寨山 M1	男	中型			1			5	II
24	石寨山 M71	男	中型		1	2	1		1	II
25	石寨山 M3	男	中型		1	2	3		2	II
26	石寨山 M10	男	中型		2	2	1		5	II
27	石寨山 M11	男	中型			1			3	II
28	石寨山 M12	男	大型		1	4	2		13	II
29	石寨山 M13	男	小型		5	4	8	2	11	II
30	石寨山 M18	男	不详			1			3	II
31	石寨山 M19	男	小型			1				II
32	石寨山 M20	男	中型			2			6	II

33	石寨山 M21	男	大型		1			2		II
34	石寨山 M22	男	中型			1	1	1		II
35	石寨山 M4	男	小型				1		1	II
36	石寨山 M6	男	大型		2	2	5		8	II
37	石寨山 M7	男	中型		1	1	1			II
38	八塔台 M41	男	小型				1			II
39	李家山 M47	男	大型			1			5	II
40	李家山 M51	男	大型		1	1	1		4	II
41	李家山 M57	男	大型			1			4	II
42	李家山 M68	男	大型				7		4	II
43	李家山 M71	男	小型				1			II
44	八塔台 M69	男	中型				1			III
45	李家山 M69	女	大型						5	III

首先，本文对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墓主人性别进行了统计（表一）：

从墓葬规模上看，可以将这 45 座墓葬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它们对应墓葬长度分别是 4 米以上、2.5~3.9 米和 1.5~2.4 米，其中大型墓葬 16 座，中型墓葬 21 座，小型墓葬 7 座，不详 1 座。由此可见，出土有塑牛青铜器的墓葬多数为大、中型墓葬，占到总数的 82.2%。

从性别构成上看，根据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对性别的判定标准，即出土大量兵器的为男性墓，出土大量纺织用具的为女性墓^[12]，并结合其他墓地发表材料中对墓主人性别的判断，可以发现这 45 座墓葬中男性为墓主人的有 37 座，女性有 7 座，男女合葬有 1 座。这些墓葬中，男性墓占总数的 82.2%，有绝对优势。女性墓葬中，全部为大、中型墓葬，其中有 6 座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的墓葬，仅有李家山 M69 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墓葬，此墓为二女合葬墓，长 6.76 米，是目前所见滇文化中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

然后，本文又对这些墓葬出土塑牛造型青铜器的器型和数量进行了分类统计（表一），我们发现，这些青铜器的器型和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相应的变化：

1. 生活用器，塑牛造型仅流行于第 I 阶段，进入第 II 阶段后就不再将牛作为装饰物焊铸在生活用器上。

2. 兵器，第 I 阶段焊铸牛的墓葬数量占第 I 阶段墓葬总数的 9.1%，第 II 阶段焊铸牛的墓葬数量占第 II 阶段墓葬总数的 42.9%，是第 I 阶段的三倍多。

3. 礼器，第 I 阶段焊铸牛的墓葬数量占第 I 阶段墓葬总数的 54.5%，第 II 阶段焊铸牛的墓葬数量占第 II 阶段墓葬总数的 76.2%，出现比率略有上升。

4. 装饰品，第 I 阶段有塑牛造型的墓葬数量占第 I 阶段墓葬总数的 31.8%，第 II 阶段有塑牛造型的墓葬数量占第 II 阶段墓葬总数的 61.9%，是第 I 阶段的近两倍，且单墓出土数量远远高于第 I 阶段。

5. 牛，第 I 阶段出土的墓葬数量占第 I 阶段墓葬总数的 40.9%，第 II 阶段出土的墓葬数量占第 II 阶段墓葬总数的 14.3%，第 I 阶段是第 II 阶段的近三倍。

6. 牛头，第 I 阶段出土的墓葬数量占第 I 阶段墓葬总数的 9.1%，第 II 阶段出土的墓葬数量占第 II 阶段墓葬总数的 71.4%，是第 I 阶段的近 8 倍，且总数和单墓出土数量都相对高于第 I 阶段。

7. 在滇文化的大型墓地中，第 III 阶段的墓葬是屡有发现的，但是目前仅见 2 座出土塑牛造型青铜器的墓葬，这一现象可能不是发现不平衡所导致的，而是到了这一时期，塑牛造型已经基本上从青铜器的铸造和装饰上消失了，仅见塑牛扣饰和牛头。

三、分析和讨论

通过上文的介绍和论述,我们发现滇文化中有塑牛造型的青铜器及其出土墓葬有着一定的规律性,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些现象呢?

关于滇国的文献记载寥寥无几,而且所记载多为关乎滇国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探寻滇文化塑牛青铜器规律性的认识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本文对这些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和分析,主要是从考古学实证的角度进行初步的讨论。

第一,牛在滇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作为礼器的青铜伞盖顶部焊铸了牛的造型,可见牛在滇文化中的重要性。从出土塑牛青铜器墓葬的规模来看,大、中型墓葬占了 82.2%,可见塑牛青铜器不是一般平民在死后能够随葬的,随葬塑牛青铜器的墓主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地位。从出土塑牛青铜器墓葬的墓主人性别来看,男性占到了 82.2%,可见男性与塑牛青铜器的关系应更为密切。而且出土塑牛青铜器的 7 座女性墓葬中,有 6 座的时代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可见在这一时期,女性在滇国仍有一定地位,或是掌握了部分社会权力。到了西汉中后期,不见塑牛青铜器在女性墓葬中出土,可见这一时期女性在滇国的地位应是下降了。

但是,李家山 M69 作为大型墓葬,又是女性墓葬,且出现在第 III 阶段,其情况显得十分特殊。但是从发掘情况来看,这一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李家山 M69 是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中的大墓之一,墓主人可能为两名女性。M69 的西南侧为 M68,两墓规模接近。M68 是一座男性墓葬,随葬大量的青铜器,这是李家山墓地两次发掘中最大的墓葬,其年代为西汉中后期。李家山 M68 的墓主人很可能是汉武帝设益州郡后统领滇民的一代滇王,而从 M69 紧邻 M68 来看,此墓的两位女性墓主人极有可能是 M68 墓主人的妻妾。原报告根据出土器型的演变,将 M68 的年代定在西汉中晚期,M69 的两位女性墓主人可能死亡时间相对要晚,因此其年代才晚于 M68,但同时仍享受了较高等级的待遇。

第二,滇文化中有塑牛造型的青铜生活用器,均出现在第 I 阶段,而且造型独特,如铜尊、铜针线盒、铜枕、铜案等器型,均是滇文化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从第 II 阶段开始,不仅带有塑牛造型的生活用器消失殆尽,而且这一时期,汉式的铜釜、铜釜、铜盘、铜壶、铜洗等器型开始增多。从第 I 阶段到第 II 阶段,影响滇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汉武帝于公元前 109 年征服滇国,“滇王离难,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3]。这一事件对滇国来说是颠覆性的,从此,汉文化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了滇国地区。滇文化本身独有的青铜生活用器可能在这一时期被来自中原的汉式器型所取代,随着青铜器这一载体的变化,塑牛造型也随之在滇文化生活用器上销声匿迹了。

第三,我国古代礼器使用十分发达,这些器物多在祭祀中使用,是敬天祭神的媒介。礼器上的纹饰往往有通神的意义,例如商周青铜重器上模铸的饕餮纹以及良渚文化玉琮上刻划的神人兽面纹等。滇文化中的青铜礼器从第 I 阶段到第 II 阶段都普遍使用,可见这些礼器在滇文化中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牛、虎、鹿、豹等造型在礼器上出现,可见这些动物在滇国的祭祀活动中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而且,第 II 阶段正是滇国从王国成为属地的转型期,上层社会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追思滇国以往的繁荣,以此来弥合被汉王朝征服的心理创伤,由此所产生的就可能是祭祀活动的增多和礼器使用的频繁,因此第 II 阶段礼器的出现比率也略有上升。

滇文化中的青铜兵器上有很多都有精美的纹饰和逼真的塑像,从观察来看,其中一部分器物的刃并不锋利,它们可能已经不再是作战时使用的实用器,而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礼兵器。兵器对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在很大意义上是军权的象征,滇文化的兵器作为礼器来使用,这说明在滇文化中,军权和神权是较为集中的。而牛、虎、鹿、豹等动物作为附加纹饰出现在礼兵器上,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的对象。滇文化中有塑牛造型的青铜兵器在第 I 阶段还不多见,但是到了第 II 阶段其出现频率增加了许多,可见,随着这一时期利益活动的增多,这些有附加造型的兵器在功能上可能分担了部分礼器的作用。

第四,牛、虎、鹿、豹等动物应是滇文化的图腾或是所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它们所附载的

生活用器应是家中使用的实用器，而（礼）兵器和礼器应是祭祀或敬神等重要场合才会使用的青铜重器，这些器物只能在特定的场合才能彰显其所有者的身份和地位。滇文化所见的青铜扣饰造型丰富，这些扣饰有简单便携的优势，随身携带这些铸有动物图腾的扣饰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佩戴越多，身份越高，这一点是那些青铜重器难以做到的。第Ⅰ阶段的塑牛青铜扣饰已较为发达，到了第Ⅱ阶段，不仅在出现频率上增多，而且单墓出土数量从第Ⅰ阶段的最多3件到第Ⅱ阶段最多8件。由此可见，部分滇人在滇国时期就比较重视以扣饰来突出个人的地位，被汉王朝征服后，可能受中原等级制度的影响，更是以随身佩戴扣饰的种类和数量来体现不同等级人群的差异。

第五，滇文化的牛和牛头在不同出土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对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牛，第Ⅰ阶段发现较多，出土时有的放在了漆器上，如李家山 M17: 22，这类牛应是属于漆器上的装饰物。牛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勤力的象征，而牛在西方文化中却是宗教神灵崇拜的对象^[14]，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牛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含义，但是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从牛的造型频繁出现来看，滇文化对于牛的崇敬非同一般。尤其是在羊甫头 M113 和 M108 中分别出土了一件漆牛和两件陶牛，可见在第Ⅰ阶段，牛的地位可能更加明显。

其次，对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牛头，有的出土时位于棺槨旁，可能是作为棺槨的装饰物，如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的一些墓葬中就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这就是第Ⅰ阶段出土铜牛头的墓葬很少，但是到了第Ⅱ阶段却突然增多，单墓出土的数量也较多，与此同时，第Ⅱ阶段出土青铜牛的比例却大大减少。从第Ⅰ阶段李家山 M18 出土的一对牛头来看，它们放在了成堆的海贝上，应与财富有关，而且已有学者考证出现在青铜器图画纹饰上的牛头应是财富的象征^[15]。但是在第Ⅰ阶段可能滇人对神的崇敬高于对财富的追求，因此随葬的青铜牛相对较多。而西汉中后期，滇国实际上已经被汉王朝接管，绝对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滇人对财富的追求可能逐渐取代了对权力和神的追求，这才导致了这一阶段大、中型墓葬中青铜牛头的增多。

第六，滇文化出土塑牛造型青铜器的墓葬在第Ⅲ阶段急剧减少，仅有2座墓葬，从这两座墓葬的墓主人来看，非同一般。八塔台 M69 出土了一枚铜印，篆书“辅汉王印”，而且该墓长3.9米，在整个墓地中是规模最大的。从随葬品来看，该墓也是整个墓地中随葬器物最丰富和最多的。该墓的随葬品中有大量的汉式器物 and 汉代五铢钱，能够体现滇文化因素的很少，而双牛扣饰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扣饰作为在滇民中彰显身份和地位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仍有体现，但已寥寥可数。李家山 M69 墓主人的身份和年代在前文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M69 出土有贮贝器和执伞铜俑，这些是滇文化的典型器型，但在这些器物上并无塑牛造型。此墓出土了5件铜牛头，其中不排除有作为棺槨装饰物的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牛头作为财富的象征，虽然 M69 墓主人的身份较为尊贵，但是进入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时，随着滇人与汉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虽然一些上层人士仍保留了一些较为典型的滇文化青铜器，但是其民众可能已不再将牛作为崇拜对象和权力象征来看待了，这些铜牛头可能仅意味着以财富为代表的社会地位。

四、小 结

本文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滇文化塑牛青铜器展开的，滇文化青铜器上所塑的动物造型远不止牛这一种造型，因此我们对塑牛青铜器发展规律和成因的认识可能代表不了所有塑有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但是从出现频率来看，塑牛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附加装饰，我们认为这种器型的发展规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他同类青铜器的发展模式。

经过上文的介绍、统计和讨论，大致了解了滇文化塑牛青铜器的种类、发展规律和成因。将本文的认识与滇国的历史相结合，可以发现，滇文化塑牛青铜器的出现应是在战国晚期，此时是滇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各类青铜器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各种塑牛青铜器都有发现，滇文化的自身因素十分明显，汉文化因素仅有少量的渗透。滇国的强盛大约延续了约二、三百年，终被汉王朝征服，汉文化因素开始大量进入滇文化中。此时塑牛青铜器的种类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

化，人们可能逐渐放弃了对神和权力的崇拜，而是开始了对滇国往昔强盛的追思和对财富的追求。西汉晚期以后，随着滇文化主体因素逐渐融入汉文化中，典型的滇文化因素越来越少，塑牛青铜器极为罕见，而仅有的塑牛造型可能仅仅是代表了一定的财富和地位。最终在东汉时期，滇文化典型器物已基本绝迹，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是典型的汉文化因素，此时滇文化因素已全部融入到了汉文化，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澄江金莲山考古研究”（10BKG006）的资助。

A study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an Chieftdo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bronze ware which makes with the cattle shape

WU Jing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animal shapes on the bronze wares of the Dian Culture, which the cattle shape is relatively more. We introduced the bronze ware which makes with the cattle shape and made the statistics of their feature, and then we conclude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tudy, we associated these bronze war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an Chieftdom, and we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cattle shape and these bronze ware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an Chieftdom.

Key words: the bronze ware which makes with the cattle shape; the society of the Dian Chieftdom;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注 释

-
- [1] 蒋志龙. 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358.
 - [2] 蒋志龙. 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206~207.
 - [3] 张增祺. 滇文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4] 樊海涛. 从“缚牛扣饰”看滇国的斗牛活动[J]. 四川文物，2007（3）.
 - [5] 晋宁石寨山墓地目前已经过五次发掘，墓葬编号是连续编号，其中第一、二、五次出土有塑牛青铜器，分别是：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M1、M2）. 考古学报，1956（1）.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M3~M22）. 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晋宁县文物管理所. 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M]（M51~M86）.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6] 江川李家山墓地目前已经过两次发掘，墓葬编号是连续编号，两次发掘均已发表正式报告，分别是：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J]（M1-M27）. 考古学报，1975（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M]（M28-M86）.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7] 呈贡天子庙墓地目前已经过三次发掘，仅在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塑牛造型，材料已正式报道，参见：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呈贡天子庙滇墓[J]. 考古学报，1985（4）.
 - [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 昆明羊甫头[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11] 蒋志龙. 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177~207.
 - [12]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75（2）.
 - [13] 史记[M]. 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 [14]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百姓拜金牛犊》中记载，以色列人由于从埃及出奔不久，尚未摆脱从埃及耳濡目染的习俗，就利用黄金打造了金牛犊，当作耶和華上帝的形象来膜拜.
 - [15] 樊海涛. 再论云南晋宁石寨山刻纹铜片上的图画文字[J]. 考古，2009（1）.